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08

《一切皆被照亮》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①

曾桂娥

(上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 上海 200072)

摘要: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厄的小说《一切皆被照亮》以一位美国犹太青年作家前往乌克兰寻根的经历为线索,借助魔幻现实主义重构个体层面的家族史和社会层面的犹太集体记忆。通过探讨小说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的关系,该小说体现了新生代犹太作家在后大屠杀时代继承创伤、延续犹太性,并以文学想象表现历史“真相”、照亮未来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福厄;《一切皆被照亮》;后记忆;犹太性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1-0039-08

Approaching “Post – Memory” and Jewishness in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ZENG Gui-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 As a salutation to the Holocaust literature tradition, Jonathan Safran Foer’s first novel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explores the issues of memory and Jewishness in the post – Holocaust era. Through a quest – for – holy – grail style process, the protagonist searches for the root of the family history, and the novel reveals how the new – generation Jewish American writer endeavors to inherit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transmit post – memory and endow the Jewishness with new imp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theo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 –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 and Jewishness. It concludes that literary imagination helps “non – survivors” construct the post – memory, which is essential for the post – Holocaust generations to pass on Jewishness with new illuminations.

Key words: Jonathan Safran Foer;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post – memory; Jewishness

记忆与犹太文化身份认同是美国犹太文学中的恒久主题之一。以安齐娅·叶齐尔斯卡(Anzia Yeziarska)和亚伯拉罕·卡恩(Abraham Cahan)为代表的早期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犹太作家大多描写移民生活和文化同化问题^{[1]228};以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等为代表的第二、三代犹太作家借助刻画文化矛盾、代际矛盾等议题讨论犹太性,关注身份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犹太大屠杀催生了很多“大屠杀后意识”^①小说,主要关注如何应对创伤、建构身份认同。随着大屠杀幸存者渐渐离世,被伯格称之为“约伯的孩子们”的第二代大屠杀文学作家更多关注心理问题和神学问题,而第三代作家对

① 收稿日期:2014-04-16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3PJC06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WW035)

作者简介:曾桂娥(1978-),女,湖北钟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

① “大屠杀后意识”(也被称为大屠杀意识)不但表现为关注大屠杀给幸存者及其后代带来的心灵创伤,而且侧重用理性的眼光审视后大屠杀时代如何确立文化身份。参见朴玉:《〈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对大屠杀的深层思考》,《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第29页。

于大屠杀记忆的处理不再拘束,他们认为“记忆与创伤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体验,努力以各种形式将大屠杀创伤转化成历史”,并“将独特的个人体验纳入文学创作,同时向世人展现集体创伤,揭示后现代语境下记忆的复杂性和必要性”^[2]。出生于1977年的乔纳森·萨弗兰·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新生代美国犹太作家,作为“约伯的孙子”,他如何应对没有亲历过的犹太苦痛,将犹太性延续下去?

福厄的处女作《一切皆被照亮》(*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2002)^①是一部充满“大屠杀后意识”的小说,刻画了主人公建构犹太文化记忆和探寻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体现了青年一代延续犹太性的文化自觉。国外学界不乏对该作品的研究,罗德里格兹从伦理学角度探讨小说人物的道德选择,认为文学应该具有道德功能,将读者转化成“见证者”^[3]。弗尔探讨了后大屠杀时代受害者和施害者后代之间发展友谊的可能性。伯格认为福厄等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对大屠杀的书写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对素未谋面的前辈们的哀悼,这一书写方式是作家了解自己犹太身份的一种尝试^[2]。柯德认为作家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大屠杀,但《照亮》中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虽然隐藏不见,但清晰可辨,成为“缺席的在场”^[4]。国外对该小说的解读角度较为多元,但尚无从“后记忆”角度讨论小说的犹太性的专论。

1 “后记忆”:继承创伤

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定义“后记忆”(post-memory):后记忆描述的是后辈们与先辈们的个人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关系^[5]²²;它是“一种强有力而非常特别的记忆形式,因为它与其对象或源泉之间的关联不是通过回忆而是通过想象和创造来达成。”^[6]⁵它一方面由于隔代发生的缘故而有别于个人记忆,另一方面也因为有着深刻的个体关联而不同于历史^[7],是具有时空距离特性的“替代性”回忆,对于继承和链接代际间创伤、建构犹太身份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没有亲身经历大屠杀“浩劫”(Shoah)的美国犹太人而言,他们遭受着“代际间幽灵”(trans-generational phantom)^②的困扰,因此“想象和创造”先辈们的创伤经历是难以避免的个人体验。福厄的外祖父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福厄出生之前已经去世。他的遗物中有一张女人的照片,据说正是照片中人将他从纳粹的魔掌中救了出来。福厄曾经带着这张照片前往家族的发源地乌克兰小镇查钦布洛德寻根,但只看见了“一片彻底缺场的景象”^[8]。在《照亮》中,他塑造了一个自传式同名主人公乔纳森·萨弗兰·福厄(为了避免混淆,下文将小说中的人物称为“乔纳森”),以一种相对隐晦的手法表达代际间创伤:“最悲惨的莫过于孩童了。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们所拥有的、会来缠绕他们的回忆比较少,但是他们渴望回忆的强度却不下于镇上的老人。他们的绳子甚至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由父母和祖父母捆绑到他们身上——这些绳索没有系在任何东西上,只是从黑暗中松松垂下。”^[9]³³⁷这些既“不属于他们自己”又“没有系在任何东西上”的绳索象征着作为非亲历者的后代们所继承的先辈们的记忆,而“黑暗”既意味着这种记忆的创伤性,又预示着代际间创伤记忆因其非亲历性而显得神秘莫测。

恪守犹太文化传统是许多犹太人保持其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尽管乔纳森在前往查钦布洛德途中的旅馆里恪守犹太文化传统,不肯吃任何肉制品,在与乌克兰翻译亚历克斯交谈过程中将犹太村镇称为“shtetl”^③而不是“village”,但是仅仅在他者(亚历克斯及其祖父)面前确立犹太意识并不能完全建构其犹太身份,因为“在过去的行为与事件和当前的经历之间,‘意识一致’及‘延续感’对于个人身份意识而

① 小说中充满“照亮”的场景,包括村庄的人们目睹纳粹烧毁会堂,查钦布洛德的恋人性交时照亮夜空,老妇人莉丝塔在讲述村庄和乔纳森祖父的故事时脸上的亮光,以及大屠杀带来的彻底毁灭等。另外,Holocaust是犹太人大屠杀在英语和德语中的叫法,该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用火牺牲,其中也包含了英文“illuminated”(照亮)之意。有鉴于此,笔者将小说标题直译为《一切皆被照亮》,下文简称《照亮》。本文所引的小说译文均出自杨雅婷的译本《了了》,略作修改。

② 这一概念由匈牙利裔法国心理学家尼古拉·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和玛利亚·托洛克(Maria Torok)共同提出,特指家族隐秘的创伤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造成作为创伤的间接而非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参见黄丽娟、陶家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载《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1页。

③ Shtetl,意第绪语,专指二战前中欧或东欧地区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小村镇。

言是至关重要的。”^{[10]2} 乔纳森对犹太传统的恪守及其流露出来的意第绪语意识和历史意识只是他当前的犹太意识,奥格思婷所代表的“过去的行为与事件”(大屠杀记忆和家族史)则构成了乔纳森尚在寻找的犹太人的过去,唯有找到自己和家族的过去,他才能将现在的经历与过去联系起来,形成“意识一致”及“延续感”,治愈创伤并成功建构自己的犹太身份。

集体记忆研究的鼻祖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引发睡梦中重复出现的东西的可能是意象,也可能是记忆^{[11]74}。小说借助一些反复呈现且具有不确定性的意象来展示代际间创伤既真实又隐晦的两面性:“我不确定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场梦,还是一个记忆,因为它真的发生过。但是在我睡着时,我看到了那个房间,我在那里哀悼我儿子的死亡。……你们会记得有一只鸟撞穿了窗户而落在地上的时刻……它在垂死时翅膀如何地抽搐着;……还在地板上留下了一摊血渍。”^{[9]49}“我记得看见母亲的后背……我也记得那两只鸟栖踞在她的肩膀上,它们的嘴翘起来接近她的耳朵,仿佛要告诉她一个秘密似的。”^{[9]51} 尽管“梦中意象几乎完全脱离了社会表征系统,仅仅成为可构成各种意象组合的原材料”^{[11]74},但是梦中“儿子的死”“垂死的鸟”和“一摊血渍”等意象明确表明,创伤跨越了代际鸿沟,以碎片式的意象组合出现在梦中,困扰着后代。与亲历者的创伤记忆有所不同,代际间创伤记忆通过寄居在创伤者后代的心理空间产生作用,因此在叙述者“我”看来,“它”虽然“真的发生过”,但却是“在我睡着时”,“比鸟的本身更确切地证明了它的存在的影子”“秘密”以及“某个难以捉摸的东西”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意象进一步表明代际间创伤记忆难以把握。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主人公乔纳森才手握一张照片走上寻根之路。照片作为记忆的重要载体,被称为“带有记忆的镜子”^[12]。对于乔纳森而言,照片中的妇人意味着一段与外祖父和大屠杀有关的经历和记忆,唯有找到她才能驱赶代际间创伤的幽灵,照亮家族史中模糊的一幕,将祖辈的创伤清晰地继承下来。

了解过去主要通过象征符号、仪式研究以及史志和传记等媒介来实现^{[11]4}。在小说中,乔纳森跟随老妇人来到曾经是查钦布洛德的地方,发现昔日的乌克兰小镇如今已成一片空地,唯一能够证明其存在历史的标志只有一块以色列总理为惨遭纳粹屠戮的镇民们立下的纪念碑。官方纪念碑是官方历史的组成部分,昭示着已经“不在场”的查钦布洛德镇的历史,但往往忽略了许多创伤个体的独特经历。个人藏品则对历史进行了有效补充,成为构建“后记忆”的重要媒介。一位认识乔纳森的外祖父,但并非奥格思婷的老妇人莉丝塔的个人藏品充当了个人记忆的保护者。在她的屋子里,一个房间里的东西“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包括好几叠衣服,以及好几千双不同尺寸和款式的鞋子。”^{[9]191} 他们“看不到墙壁,因为上面贴满了相片。”^{[9]191} 另一个房间则满是装有各种私人物品、写着各种标记的盒子,其中包括戒指,钞票,照片等“犹太人的东西”^{[9]197}。这座“小型博物馆”展示了查钦布洛德黑暗的去:纳粹几乎杀光了镇上所有的犹太人,莉丝塔是唯一的幸存者,屋里的物品和照片是她从死难者那里收集而来。每一样东西都见证、承载了一段经历和记忆,而满载着各种记忆的屋子则成了一个记忆场,一座小型大屠杀记忆博物馆^①。莉丝塔对每个盒子的主人及盒里的内容一清二楚,像博物馆讲解员一样对所有的人和事娓娓道来,她的叙述成为乌克兰犹太大屠杀最生动的口述史,与她收藏的物品一起为后代留下了追忆的凭据,成为犹太大屠杀的“证据,文件,证词”^{[9]250}。

在小说中,“记忆”(memory)一词出现了25次,“记住”(remember)出现了98次,福厄对于追溯过去的努力可见一斑。他通过刻画梦境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继承祖辈的创伤,借助照片、“大屠杀记忆博物馆”以及老妇人的叙述建构起“后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同时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对家族史进行重构,以“想象和创造”进一步描述后辈们与先辈们的个人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关系,正如小说人物迪多所说:“记忆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铭记”^{[9]46},因为“记住”的过程即犹太性延续的努力。

① 笔者认为福厄擅长利用“博物馆式”写作传承记忆,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融合起来,构建文化身份。在其“9·11小说”《剧响·特近》中也能看到明显的博物馆写作特征。具体可参见拙文:《创伤博物馆:论〈剧响·特近〉中的创伤与记忆》,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91-99页。

2 “后记忆”:延续犹太性

何谓“犹太性”?赫伯格(Will Herberg)认为犹太性指“宗教和文化实体”^{[13]183};乔国强认为犹太性主要是犹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相关联的一种思想观念^{[14]17},是一种核心特性、风格和集体心理^{[15]38}。我们认为,犹太性是犹太文化身份的决定性因素,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苦难的记忆/遗忘、对宗教和文化仪式的恪守/违背以及对犹太历史的宏观/微观叙事是讨论当下“犹太性”的重要议题。因此,对与犹太性密切相关的文化记忆的建构是后记忆的核心内容。杨·阿斯曼(Jan Assmann)这样定义文化记忆:“每个社会和每个时期特有的可以重新使用的文本、图像和仪式,各个社会和时期在‘维护’它们的同时,稳定和传达了自身形象,它首先是(但不仅仅是)一种关于过去的集体共享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个群体建立了它的一致性和独特性意识。”^[16]由此可见,犹太民族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其文化记忆基础之上的,个体只有首先建构起象征着该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记忆,才能确立其个体种族身份。在《照亮》中,福厄通过描写苦难、想象家族史和犹太宗教文化仪式实现了对犹太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个人化”的历史书写。

犹太民族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其文化记忆也因此深深地烙上了苦难的印记。大多数作家将苦难视作“犹太性”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犹太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灾难感和对历史的反思^[17]。在世界历史上,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意为“从河那边来的人”。在《照亮》中,乔纳森的曾曾曾曾曾外祖母布洛德正是在河中诞生,随后被其养父阳可收养,这一情节标志着乔纳森家族史的开始。由此可见,这一家族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家族谱系史,还寄寓着犹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乔纳森在“后记忆”中重构从祖先阳可到外祖父萨福兰这七代人的家族史,体现了犹太人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神性。“七”在希伯来文化中被独特地理解和运用为与上帝相关的神圣数字,被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神学意象^[18]。然而纵观这部家族史,不难发现它处处充斥着创伤与歧视:1764年“捶胸大屠杀”(乌克兰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阳可被称为“耻辱的放高利贷者”,被迫戴上彰示其罪过的算珠盘子;布洛德因其在河中出生,且又美丽睿智而广招嫉妒,被咒骂为“肮脏的河女”和“水婴”;布洛德被疯乡绅索非欧卡强暴;寇基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镇上的磨坊,等等。这些创伤性事件无一例外地映射出历代犹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与痛楚。

福厄将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和歧视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此质问和抨击上帝的权威以及“特选子民”和“契约论”观念的合理性,同时还借助书写将苦难记录下来。在小说中,犹太人不断回忆着先辈们的历史,同时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持续不断地更新和建构象征着查钦布洛德历史与生命的文本:《祖先之书》。《祖先之书》最开始记录的是大事,例如“战争与条约、饥荒、地震、政权的开始与结束”^{[9]254},例如犹太人在乌克兰的惨痛遭遇:“他们(乌克兰人)强暴我们的孕妇,用镰刀砍倒我们最强壮的男人。他们殴打我们的孩童至死。他们强迫我们诅咒我们最神圣的经文……我们是否在祈祷:原谅我们的压迫者的所作所为?或是原谅我们遭受到这样的待遇?或是原谅你的神秘莫测?”^{[9]270-271}但后来扩展成全镇人的家族记录,“居民们将家族记录、画像、重要文件、还有私人日记都贡献出来,……这本书继续进行、扩张,愈来愈像生命。”^{[9]255}由此,这本“生命之书”成为先辈们为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记忆。正如书中记录的一样:犹太人有六种感官,除了触觉、味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外,还有第六种:记忆^{[9]258}。《祖先之书》不仅包括交往记忆,还包括文化记忆,并且二者互相渗透,成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情况下,该书记录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相”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犹太性”在这种集体记忆中得以延续。

作为犹太人的一种周期性文化标志,犹太节期分散在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借助它的反复呈现在犹太人的心理深层潜移默化地巩固犹太人的民族意识^{[19]63}。在小说中,节期这一文化仪式是犹太文化记忆在小说文本中的又一种表现方式,也是“后记忆”的深刻内容之一。纳粹在象征着犹太民族文化记忆的查钦节那天来到镇上,将得知音讯却依然如往常一样庆祝节日的犹太人屠杀殆尽。镇上的犹太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异族的侵略并不能征服他们的民族意识,虽然大屠杀毁灭了查钦布洛德犹太人的肉体,却永远无法磨灭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也无法阻止犹太人借助节期这一仪式传承民族文化记忆。

在不断以回忆、记录和节期等文化仪式进行记忆的过程中,犹太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记忆的民族”。对于犹太人来说,“记忆之真切不下于针刺的感觉,不下于它银色的光芒,或是它在手指上刺出的鲜血的味道。犹太人被针刺到,就会记起其他的针。只有借着记忆,从这次针刺追溯到其他的针刺,犹太人才能够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痛。”^{[9]258}“针刺的感觉”隐喻痛苦的经历,“追溯其他的针刺”则意味着从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善于从历史经历,特别是痛苦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遗产是犹太文化的一大特征^[20]。正如小说所言:“而若我们要为更美好的将来奋斗,难道我们不必熟悉自己的过去,并与它达成和解吗?”^{[9]275}犹太民族正是在与过去和解的过程中不断巩固民族意识并逐渐成长,一步步走向未来。

对于“犹太性”的成因,虞建华认为它首先是传统性和现代性撞击的产物,是一种互相排斥的结合^[17]。在后现代语境下,一切传统思想的权威性和经典性都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和批判,犹太传统也不例外。乔纳森在小说文本中呈现的犹太性是犹太传统与现代性互相撞击的产物,这主要体现在上帝与宗教在大屠杀这一人道主义灾难面前的苍白无力。大屠杀的成因并不是偶然的,它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指出:“大屠杀不仅仅神秘地避免了与现代性的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冲突。也正是这些规范和制度才使得大屠杀有发生的可能。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就不会有大屠杀……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21]118-51}在当前这个并不神圣的时代,现代性的发展为大屠杀的再次发生创造了可能,这正是乔纳森在小说文本中逐渐弱化上帝与宗教的力量,转而强调犹太民族自立性的原因之一。值得警惕的是,反犹主义并未随着纳粹政权的垮台而销声匿迹,近年来在欧洲甚至有沉渣泛起的迹象。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将记忆、书写以及痛定思痛作为延续犹太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意在以史为鉴,为犹太民族敲响警钟,警惕反犹主义死灰复燃和大屠杀的重演。

3 书写记忆:“照亮”历史和未来

在历史上,犹太人在乌克兰经历过三次严重创伤。19世纪末,犹太人曾遭遇几次屠杀,许多无辜的犹太人失去性命。1917年乌克兰与俄罗斯之战期间和战后,1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二战期间,约10万犹太人在基辅附近的巴比雅被乌克兰人和纳粹集体杀害。甚至在二战结束后,乌克兰还发生过数次反犹主义事件^[22]。如何表征犹太人在乌克兰的惨痛历史尤其是犹太大屠杀事件是犹太作家不懈追求的目标。这场浩劫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犹太身份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难以想象的”^[23],历史学家和作家都面临着表征危机^①。面对这一危机,福厄也有自己的困惑:“我想知道,难道大屠杀真的难以想象吗?什么是‘真相’,一个人对一个故事‘真相’的责任又是什么?想象的准确性能够代替历史的准确性吗?想象力能够代替眼睛见证大屠杀吗?”^[8]但对于未亲历者而言,“想象”一种“真相”正是延续祖辈记忆、稳固和发展犹太文化的手段之一。在表征“不可想象的”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时,父辈和祖父辈的记忆是新生代犹太作家的创作素材,但他们并非为了表征而表征,而是肩负着更重要的民族责任:书写记忆、延续犹太文化。

阿伦斯(Victoria Aarons)认为:“无论多么无意识,个人最终不能与使他/她魂牵梦萦的历史或文化语境相分离。”^{[24]9}身为犹太人的后代,福厄对种族身份的建构无疑不能脱离犹太文化记忆,也不能绕开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中最惨痛的民族灾难:大屠杀。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认为,在后大屠杀时代界定犹太性的标准并非血统或宗教,而是直接或间接经历大屠杀并认同其为犹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25]190}。伯格也认为“‘大屠杀’是犹太身份的关键”^{[26]9}。然而,对于福厄而言,大屠杀与他生活的时

① 讨论表征危机的专著包括 Michael Bernard - Donals and Richard Glejzer, *Between Witness and Testimony: The Holocaust and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P, 2001); Michael Rothberg, *Traumatic Realism: The Demands of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Marianne Hirsch, *The Generation of Post-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2)等等。

代和国家有着明显的时空距离,唯有走上寻根之路并以文学想象方式间接经历大屠杀,他才能够建立起自己与大屠杀的联系。

新生代犹太作家面临的巨大难题之一是以什么样的创作手法进行文学想象、表征大屠杀。阿多诺曾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作为新生代的福厄挑战了这一说法,试图以幽默来呈现祖辈创伤。他曾经在访谈中说:“大屠杀将一个真实的道德难题摆在作家面前:作家能用幽默的手法展示这一历史事件吗?”^[8]他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在小说中,作家时常打乱叙事的时间顺序,将查钦布洛德犹太人的集体活动与未来的时空并置,从而营造一种未来意识,并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呈现犹太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从太空中,航天员可以看到人们做爱,那是性交的光辉,历经好几个世代,才像蜂蜜般地流过黑暗,到达航天员的眼里。”^{[9]123}“当他将一道交合之光释放到宇宙中(那道光如此强烈,倘若能被驾驭、运用,而不是被放送出去、白白浪费掉的话,德国人可是连一点胜算也没有)。”^{[9]335},性交产生的光辉象征着强大生命力,又代表着希望和未来,航天员则见证了犹太民族未来的生命力和希望。在重构家族历史这一叙事主线中,乔纳森也认为“幽默是真实地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的唯一方式”^{[9]68}。他尽情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以一种幽默滑稽的方式展示查钦布洛德镇民们的生活和创伤,“捶胸大屠杀”和“撕衣大屠杀”等将创伤幽默化的表现方式不时地出现在文本之中。

然而,在家族寻根过程中见证的残酷让乔纳森否定了“幽默”方式。老妇人莉丝塔的大屠杀记忆博物馆及其结合亲身经历叙述的大屠杀回忆让乔纳森充分认识到犹太大屠杀的残酷无情,在看到祖父母的结婚照后,他的手不停颤抖,遭遇了书写危机:“一方面他似乎想要在日记里写下每一件事,写下发生的情况的每个字。但是另一方面他连一个字也拒绝写。他打开日记,又合上它,打开它又合上它,而它看起来仿佛想要从他手中飞走。”^{[9]200}见证过去的迫切渴望和创伤的无法言说性在乔纳森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激烈冲突,最终让他意识到:“我曾经以为幽默是唯一的方式,用来了解这个世界有多美好和可怕,并且颂扬生命的伟大……可是我现在认为正好相反,幽默是从美好和可怕的世界退缩的一种方式。”^{[9]205}对于时年20多岁的年轻作家而言,认识到大屠杀的严酷性、拒绝幽默表达的过程体现了年轻一代对于历史创伤的态度转变,继承创伤、正视历史才是青年一代应该承担起的历史责任。正如小说人物莉丝塔所言:“那(大屠杀)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东西。它只是事实。在那之后,根本没有想象的可能。”^{[9]244}大屠杀拒绝、扼杀想象力,使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都望而却步。在福厄看来,小说的两条叙事主线分别代表自己心中的两种不同声音,一种声音希望将大屠杀真实地叙述出来,另一种声音则希望在想象中见证大屠杀:“通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我试着展示自己当初想象这部作品时所经历的分歧。我试图使它们逐渐向彼此靠拢,以此弥合分歧,或者说,治愈创伤。”^[8]

在面对历史灾难和个体创伤时,受害者及其后代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是否能够原谅施害者及其后代。在小说中,亚历克斯的祖父具有反犹心态,称乔纳森为“那个犹太人”,并且曾经目睹一个犹太女性被德国人凌辱却无动于衷,“所有的基督教徒都从窗子里看着……他们全都把脸转开,藏了起来。”祖父的解释是“如果他们救了她,他们自己和家人都会被杀掉”^{[9]243}。在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中,亚历克斯的祖父指认自己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造成对方的死亡。并且小说暗示亚历克斯的祖父并非乌克兰人,而是一个仇恨自我的犹太人。亚历克斯最终认识到自己祖父的犹太身份,并开始认为自己既是犹太人,也是犹太人的杀人凶手。尽管如此,亚历克斯请求乔纳森原谅祖父和自己,“他是个好人,活在一个坏时代里”,“我恳求你原谅我们,并且让我们比我们实际上的更好。让我们成为好人。”^{[9]189}福厄在书写有关大屠杀的记忆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犹太人自我残杀以及受害者是否“原谅”施害者的问题,但他巧妙地借助小说主人公乔纳森的沉默拒绝给出明确答案,只是在小说最后用亚历克斯的祖父的遗言告诉读者:有罪者因为愧疚而自杀,并且告诫后者:“好好过活,让自己能够永远实话实说”;希望后辈能够坚强,“懂得良善,永远不要知道邪恶,永远不要知道战争。”^{[9]359-360}借助文学想象,福厄一方面暗示“敌友”和解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揭示了在后大屠杀时代犹太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在后现代语境中,犹太身份认同直接建立在大屠杀记忆或后记忆的基础上。因此,在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中,美国犹太群体大多将大屠杀记忆当作定义犹太身份的核心要素。在创作构思上,福厄承袭了美

国犹太文学的这一传统。巴迪克在《犹太裔美国人文学想象中的大屠杀》一文中很好地诠释了福厄所代表的那个从未经历大屠杀、业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饱受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困扰的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的情况:大屠杀以一种难以言表的创伤意识的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想象中与大屠杀产生联系成为确立犹太身份的关键^[27]212-230。在相隔一代的情况下,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以“后记忆”这一特殊的想象方式传承祖父辈的大屠杀回忆,意味着这一创伤性记忆所界定的犹太性的延续。作者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加入了法国著名犹太哲人阿兰·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所提出的“想象的犹太人”^①的行列。他探索自己的家族史和犹太身份,并以“后记忆”这一方式撰写家族史、见证大屠杀即意味着其熟悉、理解本民族的过去,并与之达成了和解。“照亮”(Illuminated)预示着作者努力凭借文学叙事打破代表犹太民族历史创伤的黑暗,照亮犹太民族的过去以及自己的犹太身份,同时也点亮犹太民族的希望。

4 结语

马拉默德有句名言:“所有人都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17]人类社会已经步入21世纪,犹太大屠杀事件距今已有70余年。越来越多大屠杀幸存者的离世意味着后代聆听幸存者证词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么,犹太民族所面临的迫切而严肃的问题是:应该以何种方式记忆这一历史事件,才能保证其独特、客观的历史价值不受当今意识形态的影响?应该如何应对和把握,才不至于“唾手送给希特勒又一次死后的胜利”?^[28]作为犹太寻根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照亮》积极在后大屠杀时代建构对大屠杀和家族史的“后记忆”,并借以打破后记忆叙事主体与真实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鸿沟。小说触及了当下极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与真实性。在海登·怀特看来,人不可能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29]。这样历史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有多种阐释的开放性话语,人们只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选择被阐释过的“历史”,这样的选择往往不具备认识论意义,只具备道德或审美意义。福厄在《照亮》中以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和基于“后记忆”的历史叙事实践了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打破了旧历史主义决定论的保守史观,克服了难以摆脱的历史“绝对真实”的哲学概念,成功地将历史事件与文学想象融为一体,从文学维度进行历史思考。据此,福厄跻身于后“9·11”作家的行列,在书写创伤的同时“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30],将民族文化心理和身份认同等议题纳入后“9·11”时代美国小说的文学想象和历史书写之中,体现了新世纪美国文学浓郁的批判意识和深厚的人文思想。

参考文献:

- [1] Rosenbaum, Thane. Art and Atrocity in a Post-9/11 World [C]// Jewish American and Holocaust Literature: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Eds. Alan L. Berger and Gloria L. Cron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2] Berger, Alan L.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and Identity in Third Generation Writing about the Holocaust[J]. Shofar: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10, 3(28): 149-158.
- [3] Rodriguez, Collado Francisco. Ethics in the Second Degree: Trauma and Dual Narratives in Jonathan Safran Foer's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J].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08, 1(32): 54-68.
- [4] Codde, Philippe. Keeping History at Bay: Absent Presences in Three Recent Jewish American Novels[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11 (57): 673-693.
- [5] Hirsch, Marianne. Family Frames: Photography, Narrative, and Post-memory [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7.

① 该词在此处特指那些未曾亲历大屠杀,却在想象中将自身与亲历者等同起来,并在替代性的大屠杀经历中界定自身的犹太身份的个体。参见林斌:《大屠杀叙事与犹太身份认同:欧茨书信体小说〈表姐妹〉的犹太寻根主题及叙事策略分析》,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第10页。

- [6] Hirsch, Marianne. *The Generation of Post – memory: Writing and Visual Culture after the Holocaust* [M]. New York: Columbia UP, 2012.
- [7] 林斌. 大屠杀后叙事与美国后现代身份政治:论犹太大屠杀的美国化现象[J]. *外国文学*, 2009(1): 96 – 103.
- [8]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An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Safran Foer* [EB/OL]. <http://www.harpercollins.com/author/authorExtra.aspx?authorID=25419&isbn13=9780060529703&displayType=bookinterview> 2002. 7.
- [9] 乔纳森·萨福兰·福厄. 了了[Z]. 杨雅婷,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0] King, Nicola. *Memory, Narrative, Identity: Remembering the Self* [M].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0.
- [11]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2] 朴玉. 多重记忆书写:论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4): 87 – 96.
- [13] Herberg, Will. *Protestant – Catholic – 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0.
- [14] 乔国强. *美国犹太文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15] Qiao, Guo Qiang. *The Jewishnes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M]. Oxford: Peter Lang, 2003.
- [16] 印芝虹. 悼之痛——高墙下的集体记忆[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4): 128 – 137.
- [17] 虞建华. 美国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及其代表价值[J]. *外国语*, 1990(3): 19 – 23.
- [18] 刘洪一. 犹太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及其效用[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4): 1 – 5.
- [19] 刘洪一. *犹太文化要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20] 徐新. 犹太文化纵横谈[J]. *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998(2): 88 – 95.
- [21] 齐格蒙特·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M]. 杨渝东, 史建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22] Feuer, Menachem. *Almost Friends: Post – Holocaust Comedy, Tragedy, and Friendship in Jonathan Safran Foer’s 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J]. *Shofar: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10, 2 (25): 24 – 48.
- [23] Kauvar, Elaine M. *Wring about the Inconceivable*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3 (44): 132 – 150.
- [24] Aarons, Victoria. *A Measure of Memory: Storytelling and Identity in American Jewish Fiction* [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 [25] Michaels, Walter Benn. *You who never was there: Slavery and the New Historicism,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olocaust* [C]//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Ed. Hilene Flanzbau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9.
- [26] Berger, Alan L. *Crisis and Covenant: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Jewish Fiction* [M].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85.
- [27] Budick, Emily Miller. *The Holocaust in the Jewish American Literary Imagination*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Eds. Hana Wirth – Neshet and Michael P. Kra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 [28] 申劲松. 从马拉默德短篇小说《湖畔淑女》看“大屠杀”与犹太身份的构建[J]. *国外文学*, 2010(2): 111 – 118.
- [29] 王岳川.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J]. *天津社会科学*, 1997(3): 71 – 74.
- [30] 杨金才. 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2): 6 – 12.

(责任校对 龙四清)